

社会资本、产业集聚度与中国对东盟投资区位选择

熊 彬, 罗 科, 龙鼎文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昆明 650500)

摘要:以数理模型为基础,将社会资本、产业集聚度置于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中,同时检验社会规范、信任和社会网络 3 个细分社会资本维度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海外企业倾向于选择社会资本丰裕、产业集聚度高的东盟国家投资,社会资本和产业集聚两者相互促进,对区位决策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东盟国家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华人华侨网络对海外企业投资区位选择有正向影响。基于此,应充分了解东盟国家华人华侨网络,利用孔子学院“汉语+”项目提高东盟国家人力资源水平,加强东盟国家跨境经济园区建设,以帮助中国企业做出恰当的投资区位选择。

关键词:社会资本;产业集聚;区位选择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3)08-0066-06

2021 年,在全球贸易极度萎缩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逆势增长,韧性十足,连续两年互为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同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达 19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8%。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和东盟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中国和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有着深厚的合作底蕴和发展潜力。完善区域生产网络,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合作空间,把握投资发展机遇,是深化“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

但值得注意的是,东盟整体差异化特征明显。近些年来,各国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给中国企业投资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首先,东盟国家政治体制比较多元。既有君主立宪制的泰国、议会共和制的新加坡,也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老挝和越南。其次,海外华人文化和社会网络影响力强大。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是世界上华人分布最多的国家,华人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掌握了国家大部分财富,对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近年来东盟国家对汉语文化的学习热情逐渐攀升,中国在东盟设立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华人文化基础和汉语传播对促进中国

与东盟经贸往来搭建了重要桥梁。第三,东盟拥有独特的制度环境,各国营商环境差异较大。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先进超前的法律制度和滞后的执法能力并存。因此,关注东盟社会资本差异,培育以合作理念、共同认知、相互信任、互惠规范和共同利益为价值导向要素构成的区域社会资本^[1],理应成为降低中国企业投资东盟风险的一大利器。

另外,东盟大多数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工业基础薄弱,因而产业集聚度也是影响中国海外企业在东盟国家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产业集聚程度的加强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更多海外企业前往当地投资,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并带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带来负外部性,产生诸如要素价格攀升、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而阻碍中国资本流入当地市场。也就是说,过高或过低的产业集聚度都可能抑制中国海外企业开展直接投资活动的积极性。

那么,东盟国家社会资本的丰裕程度对中国海外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会构成怎样的影响?东道国产业集聚程度对跨国企业投资选择的影响又如何?社会资本和产业集聚存在互动效应吗?为厘清研究脉络,将东盟国家社会资本、产业集聚度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着重探讨解

收稿日期:2022-11-20

作者简介:熊彬(1975—),女,重庆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区域经济与国际投资;罗科(1997—),男,四川南充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龙鼎文(1995—),男,湖南郴州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决如下 3 个问题:其一,不同社会资本环境下,一国的社会资本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何关系?其二,东道国产业集聚度是否会带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较大变化?其三,基于上述影响,中国该如何充分释放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潜力?理论上,从投资东道国出发,尝试运用数理模型解释产业集聚、社会资本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实践上,建立 Clogit 回归模型,对中国海外企业进行合理投资区位选择,以期为中国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借鉴和启示。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1.1 基础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说

借鉴 Choe 和 Lee 研究中的理论模型^[2],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当改进。首先,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市场为寡头竞争市场,所有的投资者具有相同且恒定投资规模收益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而对于产业水平集聚来说,区域内同一产业的水平集聚会对同一产业的企业产生两种不同的“力量”,即“离心力”和“向心力”^[3]。其中,“向心力”指某一地区产业水平集聚,市场逐步扩大存在规模效应,此时市场存在着知识溢出等外部性,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进而吸引同一类型的企业发生水平集聚;“离心力”是指在产业水平集聚过程中,在有限的空间内会存在着竞争效应,促使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选择其他竞争力小的地点进行投资。

针对特定对象,在区域 i 中存在如下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需求函数:

$$X_i = Y_i^\alpha P_i^{-\sigma} \tag{1}$$

式中: P_i 、 X_i 、 Y_i 、 α 和 $\sigma (> 1)$ 分别为最终商品的价格、需求总量、消费者收入、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其中 α 和 σ 作为特定的行业参数,不受区域属性的影响。如果在相同区域内生产的企业相同,则该方程式在平衡状态下得出 $X_i = N_i x_i$, 其中 X_i 和 N_i 分别为区域 i 中代表企业的产出和活跃企业的数量。

由于产业集聚和社会资本存量的外部性存在,在成本最小化原则下,以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等生产要素为基础,从生产函数得出的边际成本函数为

$$C_i(w_i, g_i; N_i, S_i) = \lambda w_i^\mu g_i^{1-\mu} [\varphi(N_i, S_i)]^{-1} \tag{2}$$

式中: λ 为企业生产率; w_i 、 g_i 分别为工资和其他影响公司生产成本因素的价格; φ 为外部效应强度, N_i 和 S_i 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表示为 $\varphi = N_i^{\theta_N} S_i^{\theta_S} (N_i S_i)^{\theta_M}$, 其中 θ_N 为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S_i 为区域 i 的社会资本, θ_S 为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

θ_M 为区域内产业集聚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效应。

企业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会优先考虑预计产生最高利润的区域,于是,可以得到如下利润函数:

$$\pi_i = (1 - t_i) [P_i - C_i(w_i, g_i; N_i, S_i)] x_i \tag{3}$$

式中: t_i 为区域 i 的政府税率, $1 - t_i$ 可以在广义上表示区域政府的促销政策,包括减免公司税以及所得税。由于每个企业都按照竞争对手的产出最大化自身利润(如古诺竞争),最终获得了每个公司的产出和均衡市场价格的表达式:

$$\hat{x}_i = \frac{Y_i^\gamma}{N_i^{1+\sigma}} \left(\frac{N_i \sigma - 1}{C_i \sigma} \right)^\sigma, \hat{P}_i = \frac{N_i \sigma}{N_i \sigma - 1} C_i \tag{4}$$

将式(4)和式(2)代入方程式(3)可得到均衡利润函数:

$$\hat{\pi}_i = (1 - t_i) (N_i \sigma - 1)^{\sigma-1} \sigma^{-\sigma} \lambda^{1-\sigma} Y_i^\gamma w_i^{\mu(1-\sigma)} \times g_i^{(1-\mu)(1-\sigma)} N_i^{-[1+\sigma+\theta_N(1-\sigma)]} S_i^{\theta_S(\sigma-1)} (N_i S_i)^{\theta_M(\sigma-1)} \tag{5}$$

为了简化代数表达,假设 $N_i \sigma - 1 = N_i \sigma$, 均衡收益函数可用对数线性形式表示为

$$\ln \hat{\pi}_i = A + \ln(1 - t_i) + \gamma \ln Y_i + \mu(1 - \sigma) \ln w_i + (1 - \mu)(1 - \sigma) \ln g_i + [\theta_N(\sigma - 1) - 2] \ln N_i + \theta_S(\sigma - 1) \ln S_i + \theta_M(\sigma - 1) \ln(N_i S_i) \tag{6}$$

式中: A 为区域特征参数; Y_i 为区域 i 的收入; $0 < \mu < 1, \sigma > 1$ 。具体变量的含义、参数和性质见表 1。

据表 1 可以得出如下推论:人力成本(工资水平)过高和其他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成本因素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产生负向影响,而区域优惠税收政策将吸引外商在当地进行投资。

另外,综合相关研究文献,基于上述数理模型,做出如下假设和推论。

假设 1:产业集聚对地区的溢出效应为正,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区域生产成本减少,即参数 $\theta_N > 0$ 。

假设 2:社会资本对地区的溢出效应为正,社会资本将显著促进区域经济成本的下降,降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即参数 $\theta_S > 0$ 。

推论 1:由于产业集聚与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均大于零,推论得出两者的互动效应将显著减少地

表 1 变量具体信息

变量	含义	参数	性质
$\ln(1 - t_i)$	税收等优惠政策因素	1	+
$\ln w_i$	工资水平	$\mu(1 - \sigma)$	-
$\ln g_i$	其他影响成本因素	$(1 - \mu)(1 - \sigma)$	-
$\ln N_i$	产业集聚因素	$\theta_N(\sigma - 1) - 2$	不确定
$\ln S_i$	社会资本因素	$\theta_S(\sigma - 1)$	不确定
$\ln(N_i S_i)$	产业集聚与社会资本互动因素	$\theta_M(\sigma - 1)$	不确定

区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建厂利润,即参数 $\theta_M > 0$ 。

1.2 区位选择模型

为了说明所考虑区域之间的相似性,使用嵌套 logit 方法,其被广泛用于分析企业如何在几种竞争选择方案之间做出决策,其中因变量是每个投资者选择的区域。假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会选择将其工厂设在预计将产生最高利润的地区,如果投资企业在 j 区域获得的利润是由该位置的属性确定的,那么其表示为

$$\pi_{ij} = \beta' X_{ij} + \varepsilon_{ij} \quad (7)$$

式中: π_{ij} 为投资企业 i 选择在 j 区域 (t 时间) 投资所获利润; X_{ij} 为区域 j 中的属性向量,这些属性随投资企业特性而异; β' 为待估计未知系数向量; ε_{ij} 为未观察到的其他干扰项。

在估计方程式(7)时,使用嵌套对数(NL)估计。NL 模型中的选择问题可以通过树结构来描述。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首先在若干个子组(上层嵌套)中进行选择。随后,其在选定的子组(下部嵌套)中选择一个替代项。将上层替代项索引为 u ,将下层替代项索引为 l 。因此,在子组(u)中选择备选方案 1 的概率可表示为

$$P_{ab} = P_{b|a} P_a \quad (8)$$

式中: a 为投资各个地区; b 为每个子组中的替代方案。备选方案的条件概率和较高子组的选择概率可由下式给出:

$$P_{b|a} = \frac{\exp(\beta' X_{ab})}{\sum_n \exp(\beta' X_{an})},$$

$$P_a = \frac{\exp(\alpha Y_a + \tau_a I_a)}{\sum_m \exp(\alpha Y_m + \tau_m I_m)} \quad (9)$$

式中: X_{ab} 和 Y_a 分别为特定上层和下层类别的解释变量的向量。此外, I_a 称为 a 子组的包含值,并定义为 $I_a = \ln[\sum_a \exp(\beta' X_{an})]$,因为包含值会提供有关模型是否正确信息,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如果它们全部取值为 1(即 τ_a, τ_m),则 NL 模型等效于没有树结构的条件 logit 模型。

基于上述模型,借助国泰安数据库(CSMAR),将 2010—2017 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东盟 9 个国家(除文莱)建立海外子公司的事件作为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依据,这样的投资事件共计 947 次。在每次投资事件中,9 个国家均被视为投资区位选择的备选方案。若某一国家被选中,则在该事件中计为 1,未被选中则计为 0,最终形成了共计 8 523 条“企业-区位选择”的方案信息集合。

2 变量与数据

2.1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是指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经常性活动的互动关系中所形成的社会规范、信任和社会网络。对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资本主要由 3 个方面构成:一是从投资国直接获取社会资本,二是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三是从母公司获取社会资本。考虑第一种获取方式,借助社会规范、信任和社会网络这 3 个指标来综合衡量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规范指群体的各个成员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所遵循的规则和标准。它们是社会群体行为认知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观点,能够对本群体中的成员产生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促进群体成员的行为与整个群体保持一致^[4];对对象群体的构成、动机和教养的一般认识是社会信任,即对陌生人或社会上不太来往的对象的信任^[5];社会网络是人们互相形成的稳定且有效的社会交际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网络成员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信息公开^[6]。

世界治理指数(WGI)从话语权和问责、政治稳定性与非暴乱、政府有效性、管制质量、法制程度以及腐败控制等 6 个方面衡量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可用于评估东道国规范水平;随着孔子学院的发展,信任水平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初始阶段,政府支持建立的孔子学院具有威慑型信任,而随着项目的深入,互助与交流的不断深入构建形成了解型信任,最终形成认同型信任。3 种信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最终选择使用东道国孔子学院数量代表信任水平^[7]。最后,考虑到东盟国家华人文化的影响,采用在东盟国家的华人数量估测华人网络。选择统计年份较多,且数据连续性较好的《华人经济年鉴》、暨南大学《侨情报告》等作为华人华侨规模的数据来源,对于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对其进行补充。

界定东道国社会资本的构成后,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各因子占比及其特征值,再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乘以相关占比作为权重,得出综合指标作为社会资本的测度依据。如果中国海外企业倾向于将其工厂设在社会资本较丰裕的地区,则符合假设 2 预期。由于社会资本指标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区间内,将 logit 变换应用于社会资本测度,取 $\text{social capital} / (1 - \text{social capital})$ 的对数,从而消除其最低限制。

2.2 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产业集聚度反映了特定产业内企业的空间集

中程度,而在学界应用广泛的区位熵算法能准确地测度东道国产业集聚程度。因而选择东道国第二产业,即工业产值作为东道国产业集聚的测度依据。具体而言,将产业集聚定义为

$$\text{agglomeration}_{i,t} = \left[\frac{\ln d_{i,t}}{\sum_i \ln d_{i,t}} \right] / \left[\frac{\text{GDP}_{i,t}}{\sum_i \text{GDP}_{i,t}} \right]$$

(10)

式中: $\ln d_{i,t}$ 为第 i 个国家第 t 年的第二产业产值; $\text{GDP}_{i,t}$ 为第 i 个国家第 t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另外,重点关注社会资本(soc)与产业集聚(agg)的相互作用,将两者的乘积($\text{agg} \times \text{soc}$)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中来考察互动效应。如果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存在正向相互作用,则符合推论 1 预期。

2.3 其他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的其他变量有:①地理距离(geo)。一般而言,较远的双边距离会增加企业运输成本和获取信息的成本,使企业经营面临更大的风险。将法国预测研究中心(CEPII)测算的各个国家首都之间的物理距离作为地理距离的测度指标。②投资企业规模(size)。投资企业母公司规模越大,通常其自身获益能力愈强,对海外子公司人力物力的支撑作用亦越明显。使用投资母公司注册资本衡量投资企业规模。③基础设施质量。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港口建设质量(port)和互联网建设质量(int)两个指标来鉴别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④自然资源禀赋(nat)。自然资源充裕的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投资吸引力,但资源开发带来的巨大租金有时会使有些国家出现腐败问题,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会对直接投资产生抑制效应^[8]。以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各国矿石、金属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⑤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gdp)。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人均 GDP 指标来反映东道国的消费水平和市场潜力;⑥税率(tax)。采用世界银行各国企业收入所得税来衡量,通常情况下税率较高,企业投资决策会更加谨慎。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总样本回归结果

表 2 列出了总样本下 3 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是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考察了其余变量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模型(3)纳入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

检验两者间相互作用可能带来的互动效应。

总体来看,3 个模型中社会资本拟合变量(soc)和产业集聚变量(agg)的回归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 1 和假设 2,说明中国海外企业倾向于投资社会资本丰裕、产业集聚度高的东盟国家。究其原因,一方面,东盟国家丰裕的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其信息知识的有效传播,同时可以增进社会成员间的合作交流,降低投资风险,进而提高当地吸引外资的能力;另一方面,高产业集聚度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高度和集中和投资便利化,同样有利于海外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降低经营成本。观察模型(3)中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度变量交互项($\text{agg} \times \text{soc}$)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互动效应,可以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推论 1 成立。这可能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海外企业在对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更好地利用该地区现有的社会资本,获取生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障碍减少,投入成本自然会降低;二是产业集聚的增强也有利于该国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较高的产业集聚度一般意味着东道国各项制度体系、工业基础、人力资本等生产经营要素较为完善,这对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投资活动和长远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表 2 总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soc	1.485*** (13.31)	2.418** (2.2)	5.683** (2.52)
agg	0.851** (2.66)	2.450* (1.9)	3.054** (2.28)
agg×soc			3.585* (1.67)
ln geo		-0.616 (-1.58)	-0.438 (-1.10)
ln size		0.131 (0.78)	-0.238 (-0.85)
port		-0.148 (-0.64)	-0.017 9 (-0.07)
ln int		0.156* (1.79)	0.177** (2.02)
nat		-0.005 42 (-0.58)	-0.009 06 (-0.94)
ln gdp		0.631** (2.75)	0.630** (2.75)
ln tax		-0.792** (-2.83)	-0.383 (-1.03)
样本量	8 523	8 523	8 523
R ²	0.202 9	0.215 7	0.216 3

注:括号内的值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其他变量方面,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基础配套设施越完整,对中国海外企业的投资吸引力越强,而识别基础设施水平的另一个变量港口建设质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东道国人均 GDP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水平越高,东道国居民消费水平和市场潜力也愈好。东道国较高的税收水平会显著抑制中国企业对当地的直接投资,征税率和金额越高,企业所获经营收益不确定性变大。而其他控制变量地理距离、投资企业规模、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对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影响不大。

3.2 分类社会资本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剖析社会资本对中国海外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将社会资本细分为社会规范、信任和社会网络 3 大部分,分别考量不同社会资本类型的作用。表 3 中的模型(4)~模型(6)分别对应加入社会规范(rule)、信任(trust)和社会网络(network)维度的回归结果,并且均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

具体来看,模型(5)和模型(6)的实证结果显示信任和社会网络维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假设

2 仍然成立。由此可见,中国海外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时均倾向于选择华人较多、孔子学院数量较多的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密集的华人华侨网络和丰富的华人文化资源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投资企业借助该网络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孔子学院也为在东盟国家推广汉语教育、促进沟通交流、提升信任水平贡献颇多。而东盟国家社会规范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也即东盟国家的治理水平并不是中国海外企业选择投资对象国的重要考量。

就其他变量而言,核心解释变量东道国产业集聚水平除模型(6)以外,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向影响,与假设 1 一致。控制变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东道国人均 GDP 和税收等变量与总体回归结果相比,显著性水平有个别差异,回归系数值整体变化不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前文回归结果是部分稳健的,此处不再赘述。但另外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有较大的出入。一是地理距离因素,模型(5)和(6)的回归结果显示双边距离越远,对中国企业投资吸引力越弱,可能的原因是两国较远的地理距离会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干扰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和管理;二是投资企业规模,母公司规模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可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来讲,中国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和需求去开拓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对海外子公司形成强有力的后盾。

4 结论与启示

社会资本和产业集聚是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进行投资时区位选择的重要考量,从社会规范、信任和社会网络三个方面构建社会资本的拟合指数,利用区位熵算法选择东道国第二产业产值作为东道国产业集聚的测度依据,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运用 Clogit 模型重点探究了东盟国家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对中国海外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加入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对其互动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道国社会资本促进了知识技术的交流和传播,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了东道国社会成员之间的网络协作,有助于中国企业前往该国投资,该因素与东道国产业集聚度相互促进,对区位决策产生积极的互动效应;②从分类社会资本来看,东盟国家信任水平和华人华侨网络均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显

表 3 社会资本分类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rule	0.654 (1.57)		
turst		0.049 1** (2.14)	
network			0.165*** (4.27)
agg	3.672*** (3.40)	5.472*** (4.51)	1.675 (1.41)
ln geo	-0.299 (-0.89)	-0.866* (-1.83)	-2.211*** (-3.81)
ln size	0.305** (2.40)	0.707*** (4.15)	0.433*** (4.15)
port	-0.043 3 (-0.20)	-0.023 5 (-0.11)	-0.495** (-1.97)
ln int	0.175** (1.97)	0.309*** (3.53)	0.156* (1.91)
nat	-0.008 55 (-0.89)	-0.004 96 (-0.55)	-0.023 7** (-2.18)
ln gdp	0.460** (2.31)	0.794** (2.72)	0.158 (0.95)
ln tax	-0.936** (-3.16)	0.0461 (0.10)	0.508 (1.26)
样本量	8 523	8 523	8 523
R ²	0.215 1	0.215 6	0.219 1

注:括号内的值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著正向影响,但东盟国家社会规范水平不显著。

研究结果对于中国企业扩大“走出去”规模、降低投资经营风险,提高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企业应加强与东盟国家华人华侨商协会的联系,充分了解东道国华人企业网络现状,做出正确的投资区位选择。其次,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孔子学院“汉语+”项目优势,开展员工语言和职业技术培训,在解决“用人难”问题的同时,提升当地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源水平,缩短文化距离,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民心相通”。第三,充分掌握东盟国家产业园区建设政策,加强全产业链跨境经济园区协作,助力东盟国家提升产业集聚度,对园区入驻项目切实做好“一对一”服务,将园区打造为产业集聚、经济外溢的优质投资区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第四,企业应捕捉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建立带来的良好外部机遇,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实施的契机,利用好区内各国货物贸易减税安排和服务贸易放开承诺。

参考文献

[1] 王友云.“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合作的协议治理方式探讨[J]. 亚太经济,2021(6):12-19.

[2] CHOE J I,LEE K D.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in the location decis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Korea[J]. Asian Economic Papers,2016,15(2):71-102.

[3]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3): 483-499.

[4] 孙前路,房可欣,刘天平. 社会规范、社会监督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广义连续比模型的实证分析[J]. 资源科学,2020,42(12):2354-2369.

[5] 李涛,黄纯纯,何兴强,等.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08,43(1): 137-152.

[6] 马光荣,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2011,46(3):83-94.

[7] 孔梓. 孔子学院社会资本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15.

[8] 蒋冠宏,蒋殿春. 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 世界经济,2012, 35 (9): 21-40.

Social Capital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f ASEAN Countries and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XIONG Bin, LUO Ke, LONG Dingwen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athematical models, puts social capital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are put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the impact of social rules, trust and social network on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of enterprises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tend to invest ASEAN countries with rich social capital and hig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which promote each other and have positive external effects on location choice.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and the scale of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in ASEAN countries affect the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ositively. To make appropriate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s in ASEAN,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Chinese overseas network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local human resources by extending the “Chinese+” project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parks in ASEAN countries is also feasible.

Keywords: social capital;industrial agglomeration;location choice